

試論金德伯格 (Charles P. Kindleberger) 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思想

許書豪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曾怡仁

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1973年金德伯格 (Charles Kindleberger, 1910-2003) 提出「霸權穩定論」，後來多位學者在其基礎上持續地討論發展，成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性理論之一。然而，學界大多忽略金德伯格的整體思想內涵，事實上他學術研究的根源為歷史經濟學，強調比較分析與歷史研究方法，而這與其霸權論述是息息相關的。此外，金德伯格主張加強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互動研究，以及打開國際與國內分析層次的隔閡，而這正是後來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出不同於國際關係的研究特色。因此，本文將探討金德伯格的歷史經濟學研究方法，進而重新理解其霸權穩定論的主張，以及其對國際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的可能貢獻。

關鍵詞：金德伯格、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導權、歷史經濟學、霸權穩定論

壹、前言

不同於冷戰期間國際關係研究主要以軍事或外交等「高階政治」(high politics) 為討論重點的趨向，也不同於主流國際經濟學主張自由主義比較利益原則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的「純」經濟觀點，美國歷史經濟學者金德伯格 (Charles P. Kindleberger)¹ 將國際金融、國際貿易與跨國投資等「低階政治」(low politics) 議題同國際／國內政治權力結合，搭起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對於國際政治經濟學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的形成與發展扮演先行者角色。特別是，金德伯格在 1973 年《蕭條中的世界：1929 年到 1939 年》一書中提出「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的原初想法，認為世界自由經濟的運作需要一個有能力且願意維持秩序的霸權國存在。此霸權國不僅應負擔提供「國際公共財」(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² 的職責，且須協調各國的經濟政策差異，與領導各國在政治上合作，以促使世界經濟的穩定與開放。後來許多有關霸權穩定論的討論，如 Duncan Snidal (1985)、Robert Gilpin (1987)、Paul Kennedy (1987)、John Ikenberry (1999; 2001) 以及 Joseph Nye (2003) 等，大致上都是建立在金德伯格的研究基礎上，可見其思想在 IPE 學界的重要性 (宋學文，2004)。然而，金德伯格偏好以「領導權」(leadership) 與「責任」(responsibility) 等來替代「霸權」

¹ 金德伯格於 1948 年開始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前，有一段長時間服務於政府、軍事及金融機構，如於美國參與二次大戰前擔任「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與「聯邦儲備理事會」(Board of Governo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的經濟研究員；於大戰期間任職「華盛頓戰略服務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Washington)，負責國內物資調配與支援友邦國家的戰時合作計畫；並於戰後接任國務院經濟顧問，參與「馬歇爾計畫」(The Marshall Plan) 處理德國戰後問題與歐洲經濟復興事宜。十二年的實務經驗讓金德伯格體認到國際經濟中的政治因素，以及國際政治中的經濟因素作用，主張學術研究不能離開歷史發展脈動的觀察。

² 在《蕭條中的世界：1929 年到 1939 年》的第一版 (Kindleberger, 1973)，金德伯格提到國際公共財的形式主要有：「經濟市場的開放」、「穩定資本流動」與「國際最後借貸者」；在第二版 (1986c) 中，又增加「匯率管理」與「各國金融政策的合作」兩項 (Kindleberger, 1991: 180-81)。

(hegemony) 的概念，尤其在 1980 年代數篇文章中 (Kindleberger, 1981; 1986a; 1986b) 刻意區別兩者的差異，但這些討論卻被忽略了。如此，就無法真確掌握金德伯格的霸權穩定論內涵，更不用說能夠理解其整體的學術思想，以及評價其對後來 IPE 發展的可能貢獻，此引發了本文對於金德伯格 IPE 思想的研究動機。

本文將分成三個主要部分：一、金德伯格的 IPE 方法學；二、金德伯格對整體 IPE 發展的貢獻；三、金德伯格的領導權論述。希望透過對這三部分的討論與相互聯結，能夠對金德伯格的霸權穩定論及其整體的 IPE 思想有新的認識體會。

貳、金德伯格的 IPE 方法學

金德伯格認為，主流的經濟學過於拘泥方法論的簡約演繹要求，反而忽略了與經驗世界的接觸對話，因而主張採用歷史回顧的方式，蒐集經濟史料，並以相關經濟理論來分析經濟史的發展。金德伯格關注的範圍並不侷限在「純」經濟學領域，其嘗試從歷史的脈絡中瞭解經濟與政治、歷史、社會、文化等非經濟因素的關係。在方法學上，雖不排斥量化的研究方法，但更偏好採取質化的分析與較多的歷史經驗歸納。可以說，金德伯格基本上是以歷史經濟學方法來研究國際經濟問題，這直接影響其後續對於 IPE 及領導權論述的見解 (Kindleberger, 1990)。

一、當代經濟史學的發展

當代經濟史學是沿襲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與德國新舊歷史學派而發展的一支流派。18 世紀，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的《國富論》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將理性主義的抽象演繹法和經驗主義的歷史歸納法同時並用，把經濟學與歷史方法緊密結合，促成系統性經濟學理論的出現。到了李嘉圖 (David Ricardo)

則繼承和發揚斯密的科學抽象法，但摒棄了經濟理論的歷史觀，使得邏輯演繹方法逐漸成為經濟學主流。尤其 1870 年代經濟學在「邊際革命」（marginal revolution）之後，嚴謹的數學論證與精緻的均衡分析被奉為研究的圭臬，助使新古典經濟學崛起，確立了「量化」的方法，改變古典經濟學注重「質化」分析的傳統（胡寄窗，1996: 217-20, 253-54；隋福民，2009: 5-6）。

儘管抽象演繹方法為大部分經濟學家所接受，但仍有另一種聲音始終堅持歷史歸納法的重要性。1840 年代，德國舊歷史學派重回經驗主義的精神，羅雪爾（Wilhelm Roscher）提出歷史主義方法，主張從歷史脈絡中找尋經濟社會發展的路徑（Hodgson, 2008: 69）。後來舊歷史學派在分析上體現兩個特點：首先，承襲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國家研究與比較途徑，崇尚不同國家之間的比較研究，考察政府、經濟制度與公民社會等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擔負的角色。其次，強調歷史進程的具體研究，偏好對特定現象的詳細敘述，質疑普遍性理論與抽象演繹的方法，指出這類研究只考量到極少數樣本，忽略其他社會文化的存在與歷史特殊性的問題（胡寄窗，1996: 211-14；隋福民，2009: 6-7）。

1880 年代，施末勒（Gustav Schmoller）創建的德國新歷史學派，承接舊歷史學諸如「反對抽象演繹法」、「否定普遍經濟規律」與「增加國家制度研究」等主張。不同的是，新歷史學派認為以往史料蒐集過於鬆散，沒有一套系統性的研究方法，也沒有提出相關的一般性理論，因而採用歷史統計方法，側重歷史分期與專題研究，講求更嚴謹的資料分析，但仍堅持從經驗世界中歸納經濟行為的規律（胡寄窗，1996: 304-306；隋福民，2009: 8）。³

³ 德國舊歷史學派在方法論上的缺陷，即他們認為理論的建立可以僅僅依靠數據，事實能夠獨立於概念和理論之外。但另一方面，又認為所有的社會和經濟理論都被限定於特定的歷史現象，不能夠由經驗調查所建立，這本身卻是一個普遍性原則或理論原理。在這層次上，兩者已經產生邏輯的不一致性。申言之，舊歷史學派排斥一般性理論與強調歷史多樣性的結果，也讓他們忽略隱藏在歷史結構中的因果力量，自行限縮了普遍性通則形成的可能。況且，「進行多樣性觀察」的訴求，並無構成可以避開一般性理論建構的正當理由。在現象層面的各種結果上，是可能用單一的理論框架來解釋。若

20 世紀初，美國一些經濟學者師承德國歷史學派的歷史分析方法，從事「制度主義」(institutionalism) 的創立工作，強調對經濟社會的現實問題研究，韋勃倫 (Thorstein Veblen) 和米徹爾 (Wesley Mitchell) 等為代表性學者。制度主義學派不滿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行為者的同質性個體假設，只考量到個體會追逐自身的利益，而忽略個體與外在社會間的聯結關係。對此，他們承襲德國歷史學派傳統以來，將社會視作一個有機體的精神，講求經濟行為者與外在社會制度的互動，並把社會文化、道德與法律等非經濟因素歸為「制度」，從制度的整體面來探究經濟行為如何形成 (Hodgson, 2008: 73-75)。

到了二次大戰期間，美國制度經濟學派日益成熟，搜集與建構了美國長期以來的經濟統計資料。在此同時，多數歐陸學者赴美以躲避戰亂，後來也多投入美國的大學教育與學術研究工作，助長了美國經濟學界與歐陸經濟史學的交流 and 整合。1950 年代初期，格申科隆 (Alexander Gerschenkron)，庫茲涅次 (Simon Kuznets)、諾斯 (Douglass North)、派克 (William Parker) 與羅斯托 (Walter Rostow) 等學者，已經在積極推動經濟理論與歷史關聯性的研究。之後，格申科隆的學生康拉德 (Alfred Conrad) 和麥爾 (John Meyer) 更提倡利用經濟理論與統計分析來研究歷史的因果問題，正式樹立了美國經濟史學的研究典範，也揭開「新經濟史學」(New Economic History) 革命。由於此學派重視將量化分析方法融入到經濟史的研究中，所以也被冠上「計量史學派」(econometric history)⁴ 的稱號 (劉瑞華，1994; Parker, 1986)。

總結來說，經濟學在處理經濟與歷史關係的爭論可分成兩個脈絡。新古典經濟學將歷史研究隔離在主流研究之外，只鑽研經濟理論的一般性均衡，集中在靜態的邏輯演繹分析，追求經濟模型精緻與可預測性。德國歷

無因果關係的前提假設，只光靠經驗上的歸納方法是難以建立一個因果關係的歷史框架 (Hodgson, 2008: 87-91)。

⁴ 1930 年代，經濟學家弗里希 (Ragnar Frisch) 與丁伯根 (Jan Tinbergen) 在創建「計量經濟學」後是正式將經濟理論、數理分析和統計論證三者作為經濟學分析模式必要的組成部分(胡奇窗，1996: 333-34)。新經濟史學的發展，即強調利用計量方法研究經濟史 (劉瑞華，1994)。

史學派則扮演非主流經濟學的角色，堅持經濟與歷史的不可分割性，使用統計歸納的方法，側重動態的經濟歷史研究，從歷史分析來論證他們的經濟觀。到了當代經濟歷史學的發展，計量史學家將歷史計量方法融合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框架中，在處理模型時不僅加入了時間的參數，還考量到政治力量、經濟制度或社會文化等因素，來從事整體的經濟演進與結構變化之研究（孫濤與張蘊萍，2005）。事實上，這個轉變代表著自德國歷史學派以來的經濟史學，仍抵擋不了當時數學模型與計量經濟的風潮，逐漸偏離德國歷史學的傳統，不再講究文史修養與學派史觀，轉而投往新古典的研究途徑，注重模型分析、假說推定與量化統計等，嘗試以數理化分析重新檢定對歷史的詮釋（劉瑞華，1994: 142-47）。

二、金德伯格的歷史經濟學

金德伯格的歷史經濟學（見表一）反對新古典經濟學與新經濟史學發展以來過於強調量化或模型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承襲德國歷史學派的比較途徑與國家研究，採用較多的質化分析及歷史歸納法進行動態的研究，以理解各國經濟發展情況與經濟史的脈絡（Kindleberger, 1951; 1973; 1975; 1978）。

表一：經濟學各學派之比較

參數 \ 學派	新古典經濟學	德國歷史學派	新經濟史學	歷史經濟學
代表學者	李嘉圖、馬歇爾	施末勒、恩格斯、馬克思	格申科隆、諾斯、羅斯托	金德伯格
研究方法	抽象演繹法	歷史歸納法	歸納與演繹兩者並重	不排斥演繹方法，但側重歸納研究方法
經濟與歷史的關係	經濟為重	歷史為重	經濟為重，歷史輔之	歷史與經濟並重

金德伯格的歷史經濟學是根源於對知識與世界的看法，其主張知識是無法駕馭世界的真實樣貌，反對通則化的經濟解釋，強調社會文化的特殊性，以及透過歷史事實的歸納來充實經濟理論。換言之，歷史經濟學的研究

究包羅萬象，所以不會有單一完整的理論或模型可以用來闡釋經濟歷史的變動，不同的議題都有可能建構其獨特的史學研究。例如，他的《西歐金融史》就是以貨幣為主軸而編寫的經濟史 (Kindleberger, 1993)。另一方面，金德伯格也利用經濟理論來研究歷史發展，將特定經濟理論作為深入歷史情境研究的媒介，重新詮釋歷史的發展與變遷，並找尋影響經濟發展的可能因素 (Kindleberger, 1989; 1990; 1999)。譬如，運用「葛氏定律」(Gresham's Law)⁵ 來解釋當代金融體系不穩定的本質，認為該定律不只可以運用在「金屬貨幣」的互動，也能擴展至貨幣與其他金融資產，或兩種（以上）不同的金融資產間的關係。一般而言，持有者會評估它們的相對價格來決定持有的多寡與比例，選擇便利與具有價格的資產。以 1960 年代「美元匯兌本位制」⁶ 為例，當時美元在國際市場逐漸貶值，黃金的市場價格與官價的差距日漸擴大，使得各國中央銀行以美元取代黃金來結算債務，如此「劣幣」(美元) 驅逐「良幣」(黃金)，造成黃金在國際清算實際上已經凍結 (胡如遠, 1977: 127-29)。金德伯格認為，類似葛氏定律等經濟學理論皆擁有一定程度的解釋力，但仍須搭配具體的歷史事件，藉由經濟理論與歷史情境的對話，才得以對經濟史發展有更深刻的認識 (Kindleberger, 1989: 52-54)。

此外，金德伯格強調制度在經濟史學研究中的重要性，歷史演變過程基本上就是歷史與制度相互作用的結果。制度的形成具有許多可能性，會受到某些社會目的、歷史的偶然性、或人為刻意安排等因素的影響，但無論如何它都是從社會文化脈絡中衍生而來，能適應不同歷史情境而發生轉變。循此，金德伯格重視認同與價值的型塑，指出在凝聚力高的社會自然

⁵ 根據葛氏定律的原意，在市場上同時存在兩種「金屬貨幣」(money) 時，因為持有者會考量某一貨幣在市場的相對價值而決定持有的多寡，所以持有者會對相對價值高的貨幣（良幣）進行囤積，而拋出另一市場價值較低的貨幣（劣幣），演變成市場上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引發貨幣市場的不穩定 (Kindleberger, 1989: 62)。

⁶ 1944 年的布列敦森林會議，將國際貨幣匯兌機制以美元作為衡量標準，按 35 美元等於一盎司黃金的比值進行兌換。

而然就會有凝聚群體意識的制度產生，可以創造更多政治、經濟與社會成長的契機。社會凝聚力與制度設計兩者是相互建構的關係，社會凝聚力會創造出群體需要的制度，而若制度完善則訊息傳達系統便會產生效果，不會有任何內部的次團體被隔離在群體決策之外，國家或社會面對外在變化就可以快速作出應對之道。⁷ 在這層意義上，金德伯格欲從歷史經驗中提出兩個概念：第一、經濟利益是鑲嵌在社會結構中；第二，經濟利益或經濟機會是能夠被共同創造出來（Kindleberger, 1951: 42-46）。誠如博蘭尼（Karl Polanyi）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economic man）假定，反對將個體經濟行為從社會中剝離出來觀察（Polanyi, 1957）。金德伯格同樣修正新古典經濟學「自我利益」（self-interest）的基本命題，以集體行動與同意識來取代新古典途徑的個人主義研究方式，強調利益也能夠藉由群體之間的溝通來產生（Kindleberger, 1974; 1975）。

比較而論，經濟學、經濟史學或歷史經濟學基本上皆欲推導或歸納出經濟理論，或者解釋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當代主流經濟學者遵從實證主義的規範，指出社會科學要擁有預測的功能與模型運作的控制，就必須依循自然科學的精神追求「一般均衡理論」（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雖然經濟歷史學者也相信歷史進程存在某種通則性引導經濟事務的安排，但認為只經由相關基本命題所演繹出來的永久均衡與一體適用原則，並無法證明現實世界的真實存在，故而把焦點放在歷史發展的現象上，嘗試從過去歷史經驗中找出發展的規律性（Hodgson, 2008: 79-88; McClelland, 1975）。雖然 19 世紀的經濟歷史學者已在從事這方面工作，諸如馬克思認為物質力量為歷史轉變的動力，掌握生產工具等同操控歷史的巨輪，列寧則以帝國主義來詮釋國際資本主義的轉變（洪鎌德，1999: 79-92），但當代經濟歷史學者質疑是否真實存在主導歷史發展的單一或少數「典型化事

⁷ 金德伯格認為，社會凝聚高有三個關鍵因素：「內部社會流動」（internal social mobility）；「訊息傳達系統」（system of communications）；「價值的設定」（set of value）（Kindleberger, 1951: 45）。

實」(stylized facts) (McCloskey, 1976: 434-50)。金德伯格的歷史經濟學觀點則是介於新古典經濟學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之間，他尊重經濟理論確實存在部分的解釋效用，但不贊同新古典經濟學精簡的抽象演繹方式。另一方面，金德伯格雖不像歷史唯物論主張單一主導的歷史定律，但仍相信歷史存在某些規律或影響發展的關鍵要素，他本人就以「領導權」議題為核心構築其歷史經濟學的論述。金德伯格在建立歷史經濟學的基礎後，進一步將其方法學特點體現在 IPE 上，促成國際經濟與國際政治的互動過程研究，以及整合國內與國際層次的分析。

參、金德伯格對 IPE 的貢獻

一、國際經濟與國際政治的整合

金德伯格早在 1950 年《美元短缺》(*The Dollar Shortage*) 一書中便開宗明義表示，經濟與政治是糾結在一起，國際經濟是鑲嵌在國際政治的安排當中。由於同時牽涉到各國間的利益角逐與權力較量，所以不能單純以經濟或政治的思維來分析國際關係問題，唯有透過「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 才得以理解 (Kindleberger, 1950: 7)。舉例來說，兩次大戰期間，國際間互動大都關注於外交與軍事等政治性議題 (高階政治)，經濟性議題 (低階政治) 明顯地被放在較次要層次來考量，忽視經貿關係、資源流通或匯率管制等協商的重要性，以致後來的貿易、金融或資源衝突問題連帶影響到國際政治秩序。基於此，金德伯格特別重視國際經濟議題的效能性，如透過國際貿易擴大方案或國際匯率協調管制措施等來進行合作，以防止國際間的可能政治衝突 (Hansen & Kindleberger, 1942; Kindleberger, 1949; 1950; 1959)。金德伯格在 1950 年就能夠提出這種想法非常難得，因為當時主流的國際經濟學主張，國家應該奉行新古典的「比較利益原則」，減少對市場的干預；而國際關係研究要到 1970 年代冷戰和

緩以後，才開始重視如國際貿易、跨國投資、對外援助與國際金融等「低階政治」議題的討論。不過，金德伯格在該書中尚未提出具體的分析方法，只是透過個案研究強調國際經濟不應忽視政治因素。

1970年的《權力與貨幣：國際政治的經濟學與國際經濟的政治學》（*Power and Money: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金德伯格進一步將國際政治學與國際經濟學以統整性的方式，將兩者原先各別關注的焦點議題，相互納入到對方的研究領域，作綜合分析。金德伯格認為，諸多國際關係議題都同時摻雜了政治與經濟因素，如此可將研究分成「國際政治的經濟學」（*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與「國際經濟的政治學」（*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兩個研究領域，並以經濟和政治分析途徑⁸分別跨越學科的界線，對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議題進行研究。

金德伯格在該書中以「權力」和「貨幣」的關係，來說明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互動。在經濟學領域，貨幣被認為是衡量市場中一切物品價值的指標，也是財富累積的單位。同時，假定在自由市場中人們的交易活動都是出於自願，所以排除了對於權力配置的思考。事實上，貨幣在政治領域中也具有權力展現的手段功能，各國的金融、匯率與貨幣政策往往關係到資本流動的自由化程度，這些政策的些微調整不僅會波及國際收支的平衡，且關乎各國在國際關係中的權力分配，以及影響國際秩序的安全穩定（Kindleberger, 1970: 170-72）。此外，貨幣還包含「說服」（*persuasion*）與「強制」（*compulsion*）的性質，強權國家可以透過對外的資本借貸、國際援助與直接投資等手段，說服或強制其他國家遵循其維持下的經濟秩

⁸ 所謂的「經濟分析途徑」意味著在國際關係體系也存在經濟資源稀缺的情境，國家行為者仍以「成本－收益」作為決策時的主要考量，依舊符合經濟學理性自利個體的假定。換言之，國際關係所謂的「高階政治」其實也包含經濟性質，經濟分析途徑代表將政治領域當作經濟領域來看待，利用經濟原理來探討政治過程。相對地，「政治分析途徑」的特點在於延續傳統政治學對於權力、價值、制度與意識型態等的規範性討論，突顯與經濟學訴求實證性研究的差異（洪鑣德，1999: 228-30）。

序，避免引起各國在軍事或外交上的衝突。反觀政治的本質是權力，它擁有的工具也比較複雜，諸如軍事戰略或外交談判等。不過，以「權力」的經濟性來說，各國掌握世界資源配置的能力決定了它在國際關係中權力的大小，因而各國往往都會堅持自身的經濟目標，致使經濟議題的紛爭常會轉移到對國家主權或安全的關注 (Kindleberger, 1970: 35, 51-55)。因此，由領導國創建國際金融或相關的國際體制，協調各國朝向共同的經濟政策，及整合國際關係中的政治與經濟目標是必要的 (*ibid.*, pp. 13-15)。

除此之外，金德伯格又以「利益」的創造與分配來說明政治和經濟的互動關係。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主張，每一具自主能力的個人都會追求自己的利益，透過看不見的手，彼此間的可能利益衝突將可以得到協調，且能促進社會整體的經濟繁榮，也就是說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基本上不會衝突。金德伯格則將個人行為加總後反映的經濟現象稱作「凝聚」(aggregation) 效果，指出個人之間還存在非經濟因素的互動，以及形成「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y) 的社會網絡。另一方面，收入的差異與社會階層的不同，都會導致個人對利益或福利的認知不一致，加上市場競爭可能引發社會內部的衝突，所以市場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保證導往最大福利的結果 (Kindleberger, 1970: 18-20)。類似地，在國際層次上自由主義國關理論宣揚自由貿易所帶來的世界性利益，認為市場可以創造整體國際社會的最大利益，同時對政府參與生產及分配等經濟過程持保留態度。而現實主義則將國家在國際體系的互動視為「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均以追求短期的國家利益為優先考量。然而對金德伯格而言，世界利益除了市場效率外，還應包括正義與和平等價值，而這正代表著長期的利益。國際關係也應非是「零和遊戲」，而是存在著共同的利益。金德伯格並不否認各國會追逐自身利益的事實，因而重視如何在集體共同利益與個別國家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對此，經由霸權國家的政治領導與創造群體間共識，可以調解國際間的利益衝突 (Kindleberger, 1970: 23-31)。

從上述可以看出，金德伯格與新古經濟學保持一定的距離，其不僅重

視個人利益、物質利益或短期利益，同時也考慮如何實現共同利益、非物質利益與長期利益。毫無疑問，金德伯格對於後者是寄望於霸權國的領導角色，這是其提出霸權穩定論的背後思考。

二、比較政治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對話

如前所述，金德伯格的歷史經濟學主要是承襲德國歷史學派的比較或個案研究方法，與對國家角色的重視，認為探討國際政經秩序問題必須關注各國經濟政策的形成過程，以及如何協調各國間的政策差異。如此，他在修正主流國際經濟學的基礎上，延伸出其將 IPE 與比較政治經濟學（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PE）結合的相關概念。首先，國際經濟學沒有考量到國家並非同質的個體，社會文化脈絡或國內政治制度的差異都會導致各國在國家目標與對外經濟政策上的不同（Kindleberger, 1951）。其次，國際經濟學的「靜態分析」（static analysis）並無考量到國內層次的變化，例如科技的提升、國家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或個別國家的經濟成長等，都會影響國際經濟體系的運作（Kindleberger, 1968: 19-20）。最後，國際經濟學是以宏觀的角度來審視國家之間的生產分工和資源分配，忽略了國家在面對外在經濟環境威脅時所可能作出的回應，例如「報復」（retaliation）或「補貼」（subsidiary）等政策措施，會反過來影響國際經濟秩序（Kindleberger, 1970: 7-9）。

金德伯格在 1951 年的〈群體行為與國際貿易〉（Group Behavio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文中，即以 1870 年美國小麥大舉入侵國際市場為例，探討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與丹麥等五國在回應上的差異。若在「市場經濟」的思維下，可以預見小麥的過度供應會引發國際價格的下跌，歐洲小麥的銷售將面臨嚴峻的競爭壓力。金德伯格發現，各國對此事件的回應並不一致，此促使他深入比較各國的內部因素。德國、法國與義大利採用關稅保護政策，以維持小麥價格的穩定，並保護國內農業的發展。特別是德國與法國，利用國家力量來整合內部團體，德國發展政治聯盟，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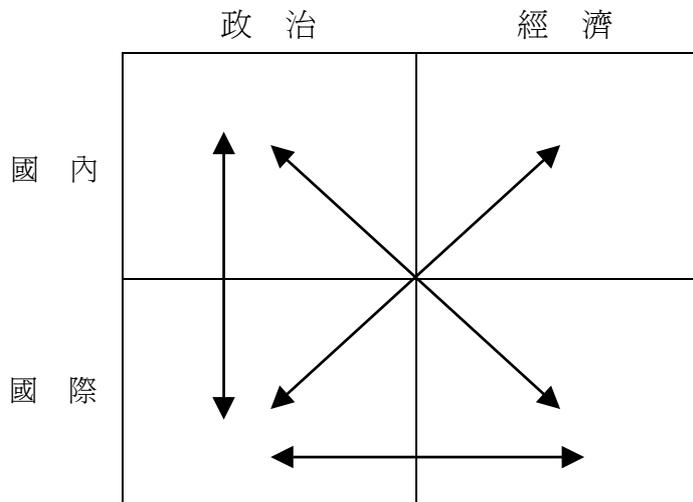
工業來支援農業發展；法國則是透過農業技術的革新，並發展類似農業合作社的組織。義大利重點擺在工業，較忽略對農業議題的關注。英國與丹麥雖無任何關稅措施，但英國適時地給予農業補貼；而丹麥則將重心轉往畜牧業發展 (Kindleberger, 1951: 30-39)。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國家的角色非常重要，在變動的環境中國家可以透過制度上的設計來凝聚社會力量，塑造新的認同與價值觀來度過難關。以上述丹麥的例子而言，其國情文化強調穩定更甚於成長、合作重於競爭關係，因而在面對國際市場變遷壓力時，國家順勢創建了一些制度以協助農業發展。例如，當時成立「俗民學校」(Folk School) 不僅提升了丹麥的農業技術，同時也成爲農民表明自身訴求的場所。

除了國家角色外，金德伯格更運用「群體行爲理論」(Group Behavior Theory)⁹ 來說明領導階級如何整合國內團體間的利益衝突，以促進國家的整體發展。他對 18 世紀德國雍克地主階級的研究得出，該階級當時成功地扮演國內團體的領導與協調角色，利用掌握政權的優勢與本身的經濟實力，整合了農民、工業與銀行等部門的利益，超越利益團體之間的衝突，因而能夠推動德國快速的現代化 (Kindleberger, 1951: 43-45)。金德伯格後來就是將這種國內領導階級的角色延伸爲國際體系中的霸權領導。

由於金德伯格注意到國內政治與社會結構對國家對外政策的影響，認爲國家利益並非抽象的客觀存在，而是反映國家與國內利益團體或階級協商後的動態結果，國際經濟衝突就是源於各國政經體制的差異，因而主張從國內層次切入來討論國際經濟秩序問題。爲了提升國內層次研究與國際

⁹ 群體行爲理論主要以社會學，人類文化學、社會心理學爲基礎，但非從事一般的人際關係或個人行爲之研究，而是關注在特定的群體關係，探究群體中成員之間的互動。其中，領導權是該理論中的核心概念，領導者就是爲了群體中某種目標而存在。更貼切來說，該理論就是在處理領導者與「追隨者」(followership) 的互動，強調在特定群體中領導者所能發揮的功效 (Bass, 1960; Kellerman, 1984)。一般來說，領導者也是群體中的一個獨立行爲體，擔負群體行動的開創者與領航者之角色。雖然具備某種程度的強制力，但領導者更重視其說服其他成員共同參與群體行動的能力，同時須整合不同意見以達成群體的目標 (Kellerman, 1984: 70)。

體系研究之聯繫，他建議可分成四個研究層次（見圖一）：（1）國際政治 — 國際經濟；（2）國際經濟 — 國內經濟；（3）國際經濟 — 國內政治；（4）國際政治 — 國內經濟（Kindleberger, 1970: 16）。至於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互動屬傳統國際關係，而國內政治與國內經濟互動則屬政治經濟學研究範疇。這可說是在 IPE 相關文獻中，最早提出具體分析層次的主張。



資料來源：Charles P. Kindleberger (1970: 16)

圖一：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四個研究層次

金德伯格常將國內經驗延伸至國際議題的討論上，從國內層次中尋找國際體系得以適用的模式，其中「國際公共財」便是金德伯格運用的另一重要概念（Kindleberger, 1959; 1968: 538-39）。早先亞當·斯密認為，公共財的提供包括國土防衛、教育、法律社會秩序與基礎公共建設，如今經濟學者更擴展到經濟穩定、收入再分配，及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的相關制度，如度量衡、語言與貨幣等，這些責任或規範通常都是由國家政府來承擔，提供公共財與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相同地，國際經濟體系的運作也需要一套標準規範及公共財，但在國際面臨的狀況是，並不存在一個可以領導

各國的中央政府，也沒有專職負責提供公共財的權威單位，因而金德伯格主張由一個領導國來擔任這個工作，從事市場開放、維持國際金融秩序與協調各國經濟政策等任務。簡單來說，金德伯格認為往往都是國家在國內市場過度的干預，但在國際層次反而沒有一套管理各國行為的機制，因而主張必須加強國際經濟市場的政治整合過程，而這正是領導國的主要責任 (Kindleberger, 1988: 182)。

肆、金德伯格的領導權論述

一、領導權的內涵

領導權的概念是金德伯格的 IPE 思想核心，在 1940 年代即從歷史經驗中提出相關的論述。他認為從 19 世紀的英國到 20 世紀的美國，在國際上扮演的角色都顯現領導者對國際秩序穩定的重要性。19 世紀領導國的國際任務是建構國際資本運作體系，而資本市場的原則大致上已由當時的強權國家－英國所確立。1920 年代與 1930 年代國際金融失序，英國與美國事實上有許多機會可以改善整體世界經濟的體質，拯救各國通貨緊縮 (deflation) 與景氣蕭條等問題，也可避免後來各國兵戎相見的困境，但當時英美兩國的許多決策是令人無法理解的。例如，美國縮減了對外國借貸的債券，導致德國、拉美與奧地利等國的銀行資金短缺，無力支付戰爭賠款。反過來美國也受到本國資金過多之累，造成股票市場的泡沫化，導致後來金融市場崩盤。金德伯格認為，若當時美國能夠發現各國的經濟是相互影響的，意識到世界脈動也關乎切身利益，則必然會去重視這些問題 (Kindleberger, 1973; 1978)。二次戰後首要任務為恢復國際秩序，並創建一個維護共同利益的世界經濟體系，這個任務在金德伯格看來同樣需要一個領導者，擁有足夠能力並且願意耗費心力去完成。美國在戰後的超強地位是無庸置疑的，其意志將直接決定國際情勢的走向，所以有責任擔起國際秩序重建的領導角色。除了援助各國恢復政治正常運作和經濟市場復甦

外，也要在國際體制創建中扮演關鍵的角色。在這層意義上，金德伯格是將世界共同利益與美國利益聯結在一起，呼籲美國政府必須理解它與世界的共生關係，把各國的政經問題納為美國國家安全的考量因素（Hansen & Kindleberger, 1942; Kindleberger, 1949; 1950; 1968）。

金德伯格當然明白世界利益或群體共識建立的難處，其始終無法擺脫各國權力與利益相爭的本質。加上隨著時代的變動，價值共識也會隨之改變，世界共同目標的設定無法僅顧慮經濟層面的「利益」或「效率」因素，在政治的世界總是充滿不確定的利益與價值取捨關係。因此，他希望透過政治來解決各國在利益或權力的衝突，諸如透過國際體制的創立與世界群體共識的形成，來體現和平與共榮的目標。尤其，群體間利益關係可以透過領導國加以整合，創造群體的共同意識和利益，協調與撫平群體間的利益糾紛，避免只關注在自身的短期利益，反而犧牲群體長期的共同利益（Kindleberger, 1975: 41）。群體活動中最常發生的就是公共財的問題與共同資源配置的困境，國際關係就像是國內開放市場一樣，也存在公共財不足的問題，因此提倡由單一領導國來提供國際公共財，因為只有領導國才有能力在自由貿易市場與國際貨幣秩序兩方面提供穩定的力量。當然，領導國從中亦可以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如此才有意願協調利益衝突與維護世界秩序，但須將其融合在群體利益中同時兼顧（Kindleberger, 1951; 1970; 1973; 1983）。

二、領導權與其他霸權學說比較

相較於國際關係學者慣用「霸權」的概念，金德伯格更偏好以「領導權」來闡述自身的理念。領導權本質上蘊含著「追隨者」（followership）的概念，採取的手段並非依憑武力的威脅，也不是單純的利益剝削（Kindleberger, 1981a: 316）。領導國的工作事實上是一種責任，除了承擔維繫國際體制或市場標準等國際公共財的成本外，更重要的是必須能夠協調各國的政策，說服其他國家共同參與國際行動，與帶領其他國家朝向開

放的貿易市場和穩定的金融秩序，如此才能取得領導國的正當性地位 (Kindleberger, 1973; 1986a; 1988)。明顯地，這種領導權的概念與後來新現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的「霸權」不盡相同。

新現實主義者吉爾平 (Robert Gilpin) 在 1975 年出版的《美國權力與跨國公司》(U.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中，從現實主義與國家中心論的觀點改造金德伯格的領導權論述，此呈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以霸權取代領導權；第二，霸權考量的並不是世界利益，主要還是本身的國家利益；第三，霸權除了經濟利益外，也追求政治利益 (Gilpin, 1975; 2002: 165-67)。可以看出，吉爾平雖然承襲金德伯格，認為世界經濟秩序需要一個強權國家來維繫，但重視從國家之間相對物質權力的大小來解釋霸權的國際行動，並注重霸權的政治權力所能為其本身帶來的國家利益 (Gilpin, 1975: 161-62)。

1980 年，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基歐漢 (Robert Keohane) 在〈霸權穩定論與國際經濟體制的變遷〉文中，以 1967 年至 1977 年間的國際貿易、貨幣、石油生產及銷售等三項作為因變數，而把美國霸權的消長作為自變數，來檢證霸權國權力與國際體制變動之間的關係。基歐漢認為，即使各國追求自我利益，但在國際體制下互動會瞭解到彼此的需求，進而促成相互依賴的利益關係 (Keohane, 1980)。縱使在霸權衰弱後國際體制仍可降低國際間交往的不確定性與交易成本，因此成員國在工具理性的私利思維下，將會選擇維繫原來的體制繼續合作，並將共同利益進一步擴大，達成更多互利的協議 (Keohane, 1984: 128-29)。就這點來說，金德伯格雖然不否認各國依然是在追求本身的最大利益，但其並不將國家視為理性合一的整體，會去追求客觀存在於國際體系結構的國家利益，而是認為利益的本質應是國內與國際層次溝通協調後的結果，因而在乎如何透過領導者來凝聚群體意識以追求共同利益。

此外，新馬克思主義學者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從資本主義的發展角度來分析霸權的內涵、模式、興衰及在世界體系中的作用

（Wallerstein, 1983）。他定義下的霸權為，在國家間體系競爭中一個大國在很大程度上能夠將它的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於文化的原則與意願加諸於其他國家（*ibid.*, p.38）。此霸權國家的主要目標在於維繫世界資本主義的分工體系，並從中汲取最大的國家利益，這和金德伯格強調領導者的責任在於維持國際經濟體系的穩定，及協調國際間的利益衝突不同。

金德伯格的領導權論述是其歷史經濟學方法的產物，其是先從關注國內利益團體或階級的領導情況，爾後才延伸到國際層次的領導研究，並且強調領導國的重要功能在於協調各國政策的一致性，但國際關係學者常將其思想改造為國家中心論或結構主義研究途徑（Guzzini, 1998）。不論新自由制度主義、新現實主義或新馬克思主義的 IPE 學者，雖然瞭解到國內因素會影響各國對外經濟政策的制定，但仍較偏重國際體系層次的研究。雖然，華勒斯坦也是從經濟史學的觀點來詮釋霸權與體系的互動，但他認為歷史就是理論，試圖將世界體系理論建構為客觀、價值中立的整體性知識（Wallerstein, 1991）。反觀金德伯格並沒有提出類似的史觀，其認為任何理論都無法完全透徹歷史發展，因而主張根據不同主題發展獨特的經濟史，如國際金融史或國際貿易史，甚至是區域性的西歐金融史等，並透過各式研究方法或理論模型去了解歷史的發展規律。¹⁰

伍、結論

一般認為，IPE 是 1970 年代國際關係學者將國際經濟議題帶入研究，促成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互動的觀察，才逐漸形成與發展的。事實上，在此之前許多國際經濟學者已經開始著手這樣的工作，包括庫柏（Richard Cooper）、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與金德伯格等皆認為，國際經濟研究無法忽略政治因素的作用，若無各國政策之間的協調則國際自由市場將

¹⁰ 詳見本文第二節。

難以達成 (王正毅, 2004; 王逸舟, 1999; 曾怡仁, 2002)。有趣的是, 當這些國際經濟學者反思新古典經濟學研究方法的侷限性, 轉而從歷史或比較方法來探究國際經濟秩序的相關問題時, 國際關係學者如基歐漢與克拉斯納 (Stephen Krasner) (1976) 等卻接納新古典的實證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研究方法, 並以個別國家行為作為研究的對象, 認為只有個體才會進行選擇和行動, 群體本身既不會選擇也不會行動 (鄭梅, 2007)。金德伯格的歷史經濟學對此就抱持相對的看法, 主張應進行歷史整體性研究, 不應把整體單純視為個體的簡單加總, 同時須考量到社會制度、文化脈絡、政治情勢等其他非經濟因素對個體或國家行為的影響。

此外, 當國際關係學者引用金德伯格的領導權概念時, 常排除其歷史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特點, 及忽略該概念是來源於「群體行為理論」。事實上, 金德伯格的領導權關注的不只是霸權與體系穩定之間的必然關係, 也不僅在於「國際公共財」的提供問題上, 而是在乎如何由領導國協調各國經濟政策的差異, 帶領其他國家朝向相同的國際目標, 以確保國際政經體系的穩定並創造共同的利益。同時, 金德伯格並不否認領導國會去追求國家利益, 但強調必須將自身利益與群體利益融合, 如此就不應該將他視為單純的「仁慈霸權」提倡者。

金德伯格的歷史經濟學特色, 不僅體現在領導權論述的形成, 也反映在對 IPE 學科發展的貢獻上。金德伯格早在 1950 年代初期就已經注意到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不可分割性, 透過對國際金融、國際貨幣與世界貿易等議題的研究, 來思考國際經濟中的政治因素。另外, 他認為國際衝突常起因於各國政經體制的差異, 所以須考量文化背景、政黨結構及利益團體關係等如何影響各國的對外經濟決策。金德伯格這種聯結國際與國內分析層次的主張, 到了 1970 年代後期才由 IPE 學者如卡贊斯坦 (Peter Katzenstein) 與柯瑞維奇 (Peter Gourevitch) 等深入發展, 建議「比較政治經濟學」(CPE) 對 IPE 研究的重要性, 以補充主流 IPE 「國家中心主義」研究傾向的不足 (Cohn, 2008)。

總之，金德伯格作為 IPE 的先行者，嚴格說來並沒有提出較為完整或統一的理論或分析架構，這或許和其主張的歷史經濟學方法有關，其強調從歷史與比較的角度對國際經濟秩序進行理解，而不是新古典式的簡約邏輯論證。這種研究方法的目的不在於能夠對未來作出預測，而是從歷史經驗中記取教訓。此外，金德伯格的研究重點在於霸權領導與國際經濟秩序穩定間的關係，較沒有深入說明霸權如何可以維持其地位，以及霸權衰退後國際秩序是否仍可以維持等問題，而後者正是包括基歐漢在內的後霸權理論關注的焦點。不過毫無疑問，金德伯格對於 IPE 後來的發展是有相當的貢獻，其不只是提供了後來霸權穩定論的研究起點，在研究方法上他重視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互動關係，及打開國際體系與國內層次分析的隔閡，而這兩者正是 IPE 不同於傳統國際關係研究的特色。

參考文獻

- 王正毅, 2004。〈爭論中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世界經濟與政治》9期, 頁 76-77。
- 王逸舟, 1999。《國際政治學: 歷史與理論》。台北: 五南圖書。
- 任東來, 1995。〈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霸權穩定理論〉《戰略與管理》6期, 頁 15-22。
- 任湘怡, 2008。〈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學轉向的啓示〉《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期, 頁 95-99。
- 宋學文, 2004。〈從層次分析探討霸權穩定論: 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演化的研究方法〉《問題與研究》4卷2期, 頁 171-96。
- 胡如遠, 1977。《國際貨幣的演進》。台北: 幼獅文化出版社。
- 胡寄窗, 1996。《西方經濟思想史》。台北: 五南出版社。
- 洪鎌德, 1999。《當代政治經濟學》。台北: 揚智文化出版社。
- 孫濤、張蘊萍, 2005。〈歷史計量學: 經濟史學研究的進展〉《文史哲》290期, 頁 158-62。
- 陳彪如, 1996。《國際貨幣體系》。台北: 五南出版社。
- 陳擢, 2006。〈論德國 19世紀初的農業改革與經濟發展〉《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8卷28期, 頁 286-88。
- 曾怡仁, 2002。〈從政治經濟學到國際政治經濟學〉《政治學報》35期, 頁 165-93。
- 隋福民, 2009。〈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對經濟史產生和發展的影響: 一種歷史角度的考察〉《江西財經大學學報》63期, 頁 5-14。
- 劉瑞華, 1994。〈新經濟史革命——介紹 R. Fogel 和 D. North 的學說〉《新史學》5卷3期, 頁 141-64。
- 韓毅, 2007。〈經驗歸納方法、歷史主義傳統與制度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期, 頁 31-38。
- 鄭梅, 2008。〈國際經濟關係的政治經濟分析——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綜述〉《深圳大學學報》25卷4期, 頁 57-62。
- Hodgson, Geoffrey M. (高偉等譯)。2008。《經濟學是如何忘記歷史的: 社會科學中的歷史特性問題》(*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Bass, Bernard M. 1960. *Leadership,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 Charness Gary, Luca Rigotti, and Aldo Rustichini. 2007.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Group Membershi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7, No.4, pp. 1340-52.

- Cohn, Benjamin J. 2008.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1975. *U. S. 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2002. "The Rise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Patrick Karl O'Brien, and Armand Clesse, eds. *Two Hegemonies: Britain 1845-1914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1-2001*, pp. 165-82. Aldershot: Ashgate.
- Gourevitch, Peter A. 1978.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pp. 882-912.
- Guzzini, Stefano. 1998.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 Hansen, Alvin H., and Charles P. Kindleberger. 1942. "The Economic Tasks of the Postwar World." *Foreign Affairs*, Vol. 20, No. 3, pp. 466-76.
- Higgott, Richard. 1991. "Toward a Nonhegemonic IPE: An Antipodean Perspective," in Craig N. Murphy, and Roger Tooze, eds. *Th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p. 97-128.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Ikenberry, John G. 1999. "America's Liberal Hegemony." *Current History*, January, pp. 23-28.
- Ikenberry, John G. 2001. "Getting Hegemony Right." *Nation Interest*, No. 63, pp. 17-24.
- Katzenstein, Peter J., ed. 1977.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1, No. 4, pp. 879-920.
- Kellerman, Barbara. 1984. "Leadership as a Political Act," in Barbara Kellerman, ed. *Leadership: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p. 63-89.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Kennedy, Paul.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 Keohane, Robert O. 1980.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 and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 1967-1977," in Ole R. Holsti,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Alexander George, eds. *Chang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pp. 131-62.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49. "Germany and the Economic Recovery of Europe." *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No. 3, pp. 288-301.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50. *The Dollar Short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51. "Group Behavior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59, No. 1, pp. 30-47.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59. "United States Economic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Requirements for 1965." *World Politics*, Vol. 11, No. 4, pp. 588-613.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68.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omewood, Ill.: R. D. Irwin.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70. *Power and Money: 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New York: Basic Books.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73.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7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y Karl Polanyi." *Daedalus*, Vol. 103, No. 1, pp. 45-52.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75.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n Western Europ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35, No. 1, pp. 20-55.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78.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A History of Financial Crisis*. New York: Basic Book.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81.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pp. 242-54.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83. "Standards as Public, Collective and Private Goods." *Kyklos*, Vol. 36, No. 3, pp. 377-95.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86a.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No. 1, pp. 1-13.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86b. "Hierarchy versus Inerti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0, No. 4, pp. 841-47.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88.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Essays on Financial Crisis and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89. *Economic Laws and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90. *Historical Economics: Art of Sci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93. *A Financial 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P. 1999. *Essays in History: Financial, Economic, Personal*.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Krasner, Stephen D. 1976. "State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 28, No. 3, pp. 317-47.
- Lake, David A. 1993. "Leadership, Hegemony,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7, No. 3, pp. 459-89.
- Milner, Helen V. 1998.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eyond Hegemonic Stability." *Foreign Policy*, Vol. 10, No. 1, pp. 112-23.
- McClelland, Peter D. 1975. *Causal Explanation and Model Building in History, Economic,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cCloskey, Donald N. 1976. "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14, No. 2, pp. 434-61.
- North, Douglass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ye, Joseph S., Jr. 2003. "The Velvet Hegemon: How Soft Power Can Help Defeat Terrorism." *Foreign Policy*, May-June, pp. 74-75.
- Parker, William N., ed. 1986.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Modern Economist*. Oxford: Blackwell.
- Polanyi, Karl.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Snidal, Duncan. 1985.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9, No. 4, pp. 579-614.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83. "The Three Instances of Hegemony in the History of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Vol. 24, Nos. 1-2, pp. 37-46.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1. "A Theory of Economic History in Place of Economic Theory?" *Revue économique*, Vol. 42, No. 2, pp. 173-80.

A Study of Charles P. Kindleberger's IPE Thought

Shu-Hao Hsu

*MA.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Yi-Ren Dzung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Abstract

Many relative studies have based on the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HST) which was founded by Professor Charles P. Kindleberger in 1973. Today, the HST has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theory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PE). However, most scholars neglect the deeper ideas of Kindleberger's theory. In fact, Kindleberger's HST originated from the Historical Economy (HE) which emphasizes the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 In addition, Kindleberger suggested that the study of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is necessary, an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level analysis need to be combined. These are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IPE.

Accordingl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Kindleberger's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Economy. Also, the study re-interprets Kindleberger's HST and points out his possible contribution to the IPE. The authors hope that this study will enrich the research of IPE.

Keywords: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histor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Kindleberger, Leadership